序章‘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的中国

-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 *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新的冒进的发生*
- *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逐步恢复*

● 粉碎‘ 四人帮 ”,结束‘ 文化大革命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年像 1976 年那样具有戏剧性。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人们的心境从大悲到大喜。对龙的故乡、龙的传人来说，这是个极不寻常的龙年。

1976 年 1 月 8 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 文化大革命 ”后期，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日趋艰难，但他事实上起着支撑大局、维系人心的作用。为使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尽可能正常地继续下去，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费尽了心血。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北京十里长街出现了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人民不仅为失去这样一位值得敬仰和信赖的领导人而极度痛苦，更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如焚。

4月上旬，北京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得人心。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工作时，同“四人帮”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涉及广泛的领域。这一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治理整顿很快取得成效，全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而对这些错误的政策和理论逐步地、有系统地纠正，就引发了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随后，又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动乱，人们的认识水平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不相同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

的抵制，其结果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决心奋起抗争。

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自 3 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也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深情，痛斥“四人帮”的罪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4 月 4 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到二百多万人次。

4 月 4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由当时根据毛泽东指定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这次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和决定随即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 月 5 日，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气愤异常，同一部分执行任务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当晚 9 时 30 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 月 7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鲜明地昭示了人心向背。它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表达的对周恩来的深切悼念之情中，也潜藏着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这就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76 年 7 月 6 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 月 9 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伟人相继辞世。这三位伟人不仅是党、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也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主要的领导者。在失去最值得信赖的三位领导人之后，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人们，更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担忧。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在报刊和广播中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四人帮”肆无忌惮的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数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消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除掉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

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并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做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虽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尖锐的，但并没有引发大的动荡。此后，中央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了河北保定等地区的武斗，全国局势逐渐走向安定。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从21日至24日,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普遍有一种重获解放之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对这一方针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担负国家领导责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各方面的工作要开展，党的自身要清理，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然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一条正确的方针、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迅速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误区中走出来，并为中国的发展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要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即展开。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接着，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此时发表这篇毛泽东在1956年的讲话，既是表达对他的纪念，也是为揭批“四人帮”提供理论指导。28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要经过三个战役：一、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三、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个部署，在此前后，中央批发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中央和地方报刊均用很大篇幅登载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文章。全国上下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陆续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加强和保证对党政军重要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以进一步稳定局势。1976年10月下旬，由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3月7日，中央通知由叶

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省份，如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中央对原有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另派得力的同志前去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首先遇到的、也是当时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要求为 1976 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平反和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前一个问题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呼声。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很快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和当时姚文元指使人歪曲事实炮制关于事件的虚假报道的经过，整理成调查材料报送中央。后一个问题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但反映的是许多干部群众的心愿。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向他及时通报中央的决策，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10 月 21 日，胡耀邦托人给华国锋带去口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①

然而，要解决这两件大事，不可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可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在这种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并不具备人们所期待和要求的那种

① 参见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 年 11 月 19 日，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38 页。

眼光和胆识。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一再要求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他还就宣传部门的工作明确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讲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当时的宣传方针被确定为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四人帮”的批判只能沿袭“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整风的套路，强调批“极右实质”，而不提批极左，即使提也限制在“形左实右”语言也是“文革”式的：“四人帮”被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报刊上还不时出现整版的“批邓”文章。对华国锋的颂扬，也出现不少过誉之词，承袭了过去搞个人崇拜的一些做法。

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日益显露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1977 年初，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再次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更加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也被人们汇编成册，广为散发。面对广大群众的这两项要求，“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最初的文字表达，出现在由汪东兴布置、为华国锋准备的一份会议讲话稿中。1977 年 1 月 21 日写出的提纲中有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由于原拟召开的会议推迟，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就先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 2 月 7 日发表了。这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快,人们就把这两句话概括为“两个凡是”。

3 月 10 日至 22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夕，一批老同志商议，一定要在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问题。在起草和讨论即将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就提出，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华国锋没有采纳；相反，他在会议开始时特意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这两个敏感的问题。 3 月 13 日,陈云不顾限制,在书面发言中直言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指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并明确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尽管这些发言因与“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而未能收入会议简报，但

许多同志在得悉他们发言的内容后都表示赞同。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试图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批邓”和“天安门事件”两个问题上，他有所退让，但又想就此止步，以避免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3月14日，他在会上讲话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还说，对待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同时，他又提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天安门事件”，他仍说是“反革命事件”，但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最后，他要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一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后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的表达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的和带有“左”倾错误的内容。此前一周，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5月1日，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

表文章，再次确认了这种说法，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升为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号召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当“文化大革命”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的时候，这样的提法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大的疑虑。

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方针议论纷纷，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这样的方针。邓小平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绵里藏针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①。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即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赞同，成为大家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两个凡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矛盾，他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由“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思想樊篱也就不再是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在“两个凡是”提出的时候，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严重的“左”倾理论观点已开始受到批判。经济理论界先行一步。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撰写文章，反对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反对把强调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等。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肯定了 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有关部门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篇好文稿,绝不是‘四人帮’所诬蔑的‘三株大毒草’①。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指导下，陆续就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文章，积极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当时，这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颇有影响，是思想领域的一块活跃的阵地。这一切预示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已为时不远。

● 国民经济的复 苏和新的冒 进的发生

粉碎“四人帮”后，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心愿，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中共中央相继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

①《国家计委关于 1977 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77 年 3 月 8 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公开发表和广泛学习，对调整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发动广大群众努力搞好生产，也起到动员作用。不过，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并没有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束缚。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首先受到整顿的是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铁路和煤炭运输行业。“文化大革命”后期，铁路运输堵塞，电厂断电。1975 年整顿后情况明显好转，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又急剧恶化。1977 年 2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规定了铁路运输的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央于 1975 年作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仍然要贯彻执行。经过这次会议，混乱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当年，铁路货运日平均装车量从 1 月份起逐月增加，到 4 月份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日卸车和煤炭运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977 年 3 月 3 日至 16 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会议就要不要抓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等十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澄清是非。同时，国务院还先后召开煤炭、冶金、农业等一系列专业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强调要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生产指挥

①参见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8 日。

系统，反对派性，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

通过上述工作，一批趋于瘫痪的企业面貌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经济战线的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从 1977 年 3 月起，全国工业总产值逐月增加。到 6 月份，有 24 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上年同期水平；80 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已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 26 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①。1977 年全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全国 60% 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②。整个国民经济摆脱了急剧滑坡的危险局面。

在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和经济形势初步好转的情况下，全国上下急于挽回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失去的建设时光，部分领导人也不冷静，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提出‘普及大寨县’口号的同时，又根据毛泽东在 1955 年提出的用 25 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提出了到 1980 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甚至具体规划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要在四年内由 40 万台增加到 80 万台。这个计划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基本以手工作业为主，拖拉机的年生产能

① 《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977 年 7 月 30 日。

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86 页。

力只有 7 万多台。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农业相关的不少部门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又直接影响到工业领域。

1977 年四五月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会议前夕，一些部门负责人头脑发热，华国锋也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向出席会议的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①]。4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重新提出“跃进”的口号。由于工业生产恢复较快，7 月 30 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乐观地指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按照这一估计，各地区、各部门开始按照新的“跃进”的要求进行筹划。

新的“跃进”的蓝图很快被描绘出来。11 月 24 日，国家计委向全国计划会议提交《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其中提出：今后八年，即到 1985 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主要包括：30 个大电站，8 个大型煤炭基地，10 个大油气田，10 个大钢铁基地，9 个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几个大化肥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将接近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到 2000 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粮食总产量由 1976 年的 5 700多亿斤达到 13 000亿斤到15 000亿斤，钢产量由 2 000多万吨达到 1.3 亿吨到 1.5亿吨；在各个生产领域多数接

①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86 页。

近、少数赶上或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许多省的工业水平将赶上和超过欧洲的某些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匆匆提出的《汇报要点》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从中不难看出以往经济建设中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华国锋对这个要点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整个设想“是积极的，有雄心壮志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①。1978 年 2 月，上述计划由华国锋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会后，又通过新闻机构广为宣传。

在经济工作中刮起的新的冒进风，使国民经济面临着重蹈 1958 年“大跃进”覆辙的危险。为实施上述庞大计划，国务院不得不一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基建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 332 亿元追加到 415 亿元，比 1977 年增加 100 多亿元，增长 34.5%，1978 年的积累率由 1977 年的 32.3% 提高到 36.6%，成为 1958年“大跃进”之后二十年中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高的年份。当时，国民经济刚刚经历十年动乱的大破坏，此时发动这样的“跃进”，就像要一个亟需大修的机器开足马力全速运转，结果可想而知。在提出这样的计划时，既没有总结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的教训，更没有吸取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按照这个计划，走的仍将是一条追求高投资、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老路。从短期来看，这套办法只能进一步加剧在“文化大革

①参见华国锋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7 年 12 月 11 日。

命”中已经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失调，给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新的困难；从长期来看，这种旧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再次引上一条死路。

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逐步恢复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期盼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能够及早恢复正常。在这种形势下，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十届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首先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华国锋在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但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的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①]。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会批准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为大会做了必要的准备。

邓小平再次复出，是十届三中全会最重要和最有

①华国锋在十届三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1977年 7月 16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